

# 回到叙述本身:保罗·利科的“事件解释学”

刘欣

**【摘要】**“事件”概念在保罗·利科的使用中不再囿于话语层面,作为文学对象的“事件”被利科纳入其“事件解释学”的路径中。通过回溯叙述作为话语事件的发生状况,区分叙述话语的层级,以及反思叙述事件的意义生成机制,利科将叙事视为一种有内在驱动力的“行动”,“事件解释学”从而构成对结构主义叙述学的批判性反思。它提醒我们,比“科学”地总结一套叙述学知识更重要的是对文学——事件及其叙述本身保持好奇,理解叙事的技艺及其走向行动的潜能。利科虽然拒绝结构主义和总体化的思维方式,但他没有赋予事件具体历史的内涵,在人文主义学术话语的层面执着于解释意义创造事件的发生过程。

**【关键词】**利科;事件;解释学;叙述学

**【作者简介】**刘欣(1986-),男,安徽桐城人,文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文艺批评研究院副教授,杜克大学访问学者,主要从事西方文论、新媒介文艺研究(浙江 杭州 311121)。

**【原文出处】**《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石家庄),2021.6.99~1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保罗·利科诗学的‘事件’概念研究”(项目编号:19FZWB068)。

在结构主义的霸权时代,“事件”在人文学术总体中被“结构”掩盖,但早至20世纪40年代的法国,抵抗的声音就一直存在,“事件”思想从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保罗·利科(Paul Ricoeur)、福柯(Michel Foucault)、德勒兹(Gilles Louis Rene Deleuze)处不断生发开来。利科自始至终都在抵抗结构主义的霸权,他承认结构主义方法的有效性,但认为这只能被视为理解过程的一部分,“所谓结构的解释模式并没有全然穷尽文本的可能性”<sup>①</sup>。也就是说运用语言学进行的解释是补充性的,使文本保持开放才能将意义重新分配给主体,解释活动于是成为意义自身的完成。<sup>②</sup>作为当代法国思想中“结构”向“事件”转向的关键人物之一,利科对结构主义排斥事件的方法作出了有力回应,并用对叙述的沉思实践了一种“事件解释学”<sup>③</sup>(l'herméneutique de l'événement)。跟随利科的这一思路,我们或可更深入地理解结构主义叙述学及其中中国范式的不足。

## 一、从“叙述学”返回亚里士多德

在结构主义叙述学那里,对事件之间联系的一般规律即情节结构的探索成为主导方向。事件按照某种逻辑法则在文本中组成更大范围的情节网络,被封闭在结构之中。在利科看来,结构主义叙述学的症结在于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即叙述学话语总是一种“事后”的逻辑建构,在叙述学家发明这些话语之前,已然存在着活生生的人类叙述活动,再向源头处追问,我们可以还原到人的叙述本能,一种认知的、伦理的、审美的综合能力,这种根本的能力催动一切叙述活动,它先于对叙述的分析而存在,利科称之为“叙述智力”<sup>④</sup>:“叙述学是一种二级话语,源自创造性想象的叙述智力自有其优先性。”<sup>⑤</sup>利科认为与其将叙述活动视为一个静止的结构,供我们从中抽取某种规律和法则,不如将其视为根本性的创造活动,一种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实践智慧(phronesis)的结果。

在利科眼中,叙述智力之所以优先于叙述学的

合理性,在于它本身已经是主体价值观念的构造物,事件的叙述化构造的是一个意义充沛的价值世界,在读者的理解活动中与现实生活世界中发生融合,产生出影响生活实践的价值空间。由此,亚里士多德的“情节编排”(即对事件的编织)仍然构成叙述作品的动力来源。在这个意义上,编织事件即将叙述智力的具体应用,不是后设的叙述学知识,而是人类特有的叙述智力催生了情节编排,使得事件之间的连接成为可能。正是情节编排的整合力使叙述成为能被人理解和解释的现象,在神话、悲剧、历史、小说各类叙述类型中发挥着各异的“事件叙述性”功能,并产生不同的伦理效应。利科在“恶的象征性”神话研究中即指出一系列关于“恶”的神话的叙述性结构,并指出亚当神话在伦理上的优越性。<sup>⑥</sup>神话、悲剧事件与历史、小说事件的情节编排共同指向人类理解时间经验的努力,通过情节编排构造一个新文本和新世界,人们通过叙述重新“理解”“制作”现实世界的实践。利科在此将事件之间连接的动力来源从后设的叙述逻辑或语法还原到作为人类的叙述智力,叙述成为主体指向事件的意向性活动。

利科同时指出情节编排中的悖论。他认为,叙述的事件是根据它与塑形活动的关系来定义的,一方面它具有情节本身不一致所带来的不稳定结构,它的突然出现会打破特定的结构预设;另一方面它又是协调的来源,因为它最终符合了历史理性。这就是情节编排的悖论:“事件的插入使得偶然效应被中断,这意味着本来会发生或不会发生的事情被整合进塑形活动实施的必然或或然的效应之中。”<sup>⑦</sup>也就是说简单的、出人意料的偶发事件被叙述趋向终点的整体性改造后,在理解中变成了文本中时间线的组成部分,事件的发生于是成为必然。这样,叙述活动在同一性与多样性之间达成了和解,这就是在给时间塑形之外达成的一种“异质综合”(对纷繁复杂的事件的综合)。从一开始,利科对叙述的思考就与结构主义叙述学拉开了距离,他的现象学-解释学进路保持了对事件及其创造意义之方式的好奇。

在三卷本巨著《时间与叙述》(*Temps et récit*)中,他将叙述视为一种“语义创新”(l'innovation sémantique),一种人类保存时间经验、理解自身和他人的中介。叙述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方式,是一种智性的精神活动,一种意向性活动,它所处理的对象即“事件”。将经验世界中纷繁复杂的事件编织为情节,形成具体可感的“故事”,这是叙述活动的一般过程。关于事件、情节、故事的区分,赵毅衡认为情节介于故事与事件之间,是故事的基本材料和叙述的最基本条件,故事则是有头有尾、有起承转合结构的情节,经验事件的媒介化构成情节的单元。于是,“事件具有可述性,就能进入情节,而叙述者对情节的处理,使文本具有‘叙述性’。也就是说,情节使事件的‘可述性’转化为文本的‘叙述性’”<sup>⑧</sup>。本属于经验世界的事件被筛选、重组,转化为符号世界中的具体可感的情节或故事,叙述文本于是成为累积、深化人类认识能力的重要中介。发生在经验世界中的事件本身并不能全为叙述所容,因为事件本身的复杂性是不可名状的,如特洛伊的陷落这一历史事件所涉及的人、事、物绝非叙述的中介可以穷尽,荷马(Homer)的叙述只是以其一己之力呈现他个人视域中的事件原貌,他对事件的选择和排列事件的方式,如以阿喀琉斯的愤怒开始,以其愤怒的平息(死亡)为终,实际上带有鲜明的个人化风格,希腊人的血气和悲剧意识在史诗的结构中凸显。将事件(生活事件、历史事件或神话事件)在声音、形象和语言等中介形式中符号化,进而编织为情节(plot),构成“故事”,叙述才能完成。

但西方古典诗学对情节、事件、行动等概念的区分并不明显。在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所区分的人类活动(实践、制作、理论)中,叙述属于制作,是一种技艺,叙述文本说到底还是技艺人(homo faber)生产的人工制品,它是一定时空背景下的产物,在《诗学》的描述中遵从严格的因果逻辑。但值得注意的是,《诗学》中的某些地方情节、事件和行动甚至可以换用。亚里士多德将悲剧分为六个成分后,集中强调情节

的优先性：“事件的组合是成分中最重要的……事件，即情节是悲剧的目的。”<sup>⑨</sup>从摹仿的对象是人的行动这一根本观点来看，诗人即事件的编制者，悲剧应该去摹仿的是能引发怜悯和恐惧的事件组成的完整行动。叙述话语在做的就是连接分散的事件，将其纳入某种编年体例，但与此同时，分散的事件通过叙述的运作被整合为一个完整的事件(情节)，就是在分散的事件中建构了意义的总体性，用摹仿行动的构型对事件的意义进行把握。在这个意义上，叙述作为语义创新(l'innovation sémantique)才能在人类认知-行动领域中具有重要的生存论价值。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曾试图区分“叙述”(diegesis)与“摹仿”(mimesis)，故事、虚构、情节的“迷所思”(muthos)与“逻各斯”(logos)。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对行动的摹仿(即情节的编排)甚至因其超越已知事件，提供了一种认识事件的或然性，而比历史更具哲学意味。可见，亚里士多德的“情节”或“情节编排”(emplotment)仍是理解叙述及其效应的关键。明克(Louis O. Mink)曾认为叙述的运作具有一种康德意义上反思判断的特征：“叙述和跟随故事已然就是带着某种目的对事件进行‘反思’，这一目的把事件融入到了序列的总体中。”<sup>⑩</sup>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则强调历史学家与小说家作为讲故事的人，将给定的、纯粹偶发事件的原材料转化为一个故事，其政治职能在于“教我们按照事情的本来面目接受它们。从这种接受而来的对真理的忠诚，带来了判断的能力”<sup>⑪</sup>。而在利科看来，叙述是通过情节编排给时间塑形(configuration)，这是一个康德式的综合判断行为：情节编排作为带有目的、经过选择的判断，本身就是对所叙事件的“反思”，这样，“叙述从分散的事件中建构意义充沛的总体”<sup>⑫</sup>。

利科的解释学触碰到叙述这一复杂话语时，显现出现象学方法追寻事物本质和具体发生过程的客观性，叙述作为话语事件发生，通过摹仿的塑形活动对事件进行编织、整合，为读者和世界增添新的意义和存在方式。可以看到“事件”概念在利科的使用中

不再囿于话语层面上，由于叙述领域的核心概念“情节”与“事件”直接相关，作为文学对象的“事件”被利科纳入其解释学之中。

## 二、编织事件的技艺

相对于言谈和直接对话引发的原初性理解，叙述话语是对事件的铭刻，它使事件在一定的记号和意义形式中固定下来，并支配隔着文本的对话者。由此，以事件为对象的叙述活动在利科的解释学中成为关键，他在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的解释学和语言哲学的基础上，将叙述话语与日常言谈、对话放在天平上细加考量。

在利科看来，伽达默尔以对普遍“语言性”(Sprachlichkeit)的认识奠定了解释活动的基础，语言性就是语言本身的一种自我陌生性(Selbstentfremdung)，对这种陌生性的克服，即对文本的阅读，被视为解释学的最高任务。“我”对一种或多种传统的参与是发生于对记号、作品和文本的解释中的，文化遗产铭存于它们之中待人解读，也正是通过这种解释的中介(语言符号)，不同情境、视界、文化传统的主体之间才能产生“视域融合”(Horizontverschmelzung)。《真理与方法》第三部分试图为支持我们生存的原初性理解进行辩护。伽达默尔认为真正的谈话不是那种由谈话者引导的、在双方意志控制之下的“合作”(如书籍、杂志中被津津乐道的“访谈录”)，而是谈话者被卷入的一种活动，其中谈话者是被引导者，谁都不知道在谈话中会产生什么结果，谈话是否能达成理解对于我们而言是不确定的，如同一件不受我们意愿支配而降临到我们身上的事件。真正的谈话具备了一种准主体式的独立精神，语言在其中言及存在本身。在这个意义上，伽达默尔认为语言能让某种东西“显露出来”(entbirgen)、涌现出来。语言的传承物，即由文字固定的文本于是走向解释学的中心。语言在文字中与作者、读者分离开来，每个能阅读它的人都可参与其中。但在伽达默尔看来，语言的书写形式(文本)并不优于谈话中的语言(被说出的话语)，伽达默尔回到了柏拉图在《斐德若》中对文字

这种语言的书写形式的责难。

针对伽达默尔对语言原初经验的重视,利科认为语言经验只能起到媒介的作用,因为对话是由谈论的对象即所谈事物来引导的,而对话双方都势必在所谈论的事物面前隐去痕迹,事物对对话者的支配在文本媒介中将更加明显:“事物对对话者的支配,在声音语音变为书写文字性时,或者换言之,当通过语言媒介变为通过‘文本’媒介时,就会更为明显了。于是使我们进入超距交流的东西就成为‘文本’的‘效果’,这种效果既不属于作者也不再属于读者了。”<sup>⑩</sup>也就是说,言谈、对话中语言的原初经验还得在体现书写文字性的文本中发挥功能,理解不是直接面对“活生生的语言”,而是面对由其书写形式构成的文本、作品和文学。我们只有对这些语言遗留物敞开自己,死的文字符号才会向我们讲述它自身,与此同时,我们也面临着柏拉图所警告的危险,即文字符号对真理的歪曲,使主体盲从虚假的权威。这在利科看来构成了解释活动的双重性:“解释学就是由这种双重动机触发的:愿意怀疑、愿意聆听严苛的誓言、服从的誓言。在我们的时代,我们还没有消灭偶像,我们还几乎没有开始聆听符号。”<sup>⑪</sup>解释学为了达成理解,必须从话语转向书写,从对话转向文本。书写及其文本在利科看来是对对话过程及内容的客观呈现,它不仅没有限制作用,甚至被赋予超越言谈、对话的意义:“虽然从历史学、心理学的角度看,书写开始于对话符号的图象化副本,但注入书写中的是作为言说意向(intention-to-say)的话语,这样书写就成为对此意向的直接印刻。书写的解放确定了对话位置上的话语,文本随之诞生。”<sup>⑫</sup>“言说意向”的话语被客观化的同时时间距化了,相对于作者意向,书写使文本获得了自主性,文本客体的意义不同于作者的主观意图,正是这种间距化促成了“视域融合”:文学文本超越了自身的心理-社会环境,将自身向几乎无限的、处于不同社会文化环境中的阅读视域开放,文本在对自身的“去语境化”之后,通过阅读行为在新的环境中重构语境。

活生生的言谈在利科看来就如同转瞬即逝的事件,它极度依赖发生的背景环境,言谈中的话语被说出后就行将消失,被对话者双方遗忘。于是就出现了书写的铭刻功能,即对消失的东西的固定,也即回忆。利科正是以此来理解柏拉图的《斐多》之于苏格拉底之死的意义,苏格拉底在临刑前讲述了一个关于大地和亡灵的神话,说明被判定为过着虔诚生活的亡灵将获得解放,重新居住于大地表面的纯洁居所中。讲完这些后,苏格拉底承认有理性的人不会相信他所说的就是事实,但这不会动摇讲述神话故事(在书写中被固定)的意义。<sup>⑬</sup>苏格拉底用临终前的宝贵时间来讲述一个貌似荒诞的神话故事,是为了给在世的学生以信心,即尽力获得善和智慧,过一种哲学式的生活的信心。而在利科看来,这正凸显了书写的意义,因为在这个例子中,是书写(对苏格拉底话语的记录)拯救了话语的虚弱无力(说出即被遗忘)。书写所固定的,就是已说出的“内容”(said),是言谈自身,说话(sagen-saying)想要说出自身的外在化就是话语的目的地:“简言之,我们所写、所印刻的就是言说的意向对象(noema)。它是言语事件的意义,而非作为事件的事件。”<sup>⑭</sup>作为事件的事件就是发生后即消逝的事件,言谈中的话语如果没有以外在形式被固定下来,就类似于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琐碎事件,不会第二次被人回忆起来。在这种简单事件维度上的话语的意义是无法捕捉的,因为它不具备一定的形式,面对它的解释活动也无法进行。这就是书写形式试图超越的东西,说话的意向必须外在化,在书写中再次对象化。在这种物质的确定化即书写的铭刻中,作者的意向与文本的意义不再重叠。这并不是说“作者已死”,可以完全无视作者来解释文本,而是说在书写中精神意向与词语意义分离了。虽然《斐德若》认为书写是一种冒险,但文本的优势就在于对作者有限视域的克服,文本所说重于作者想说。文本在解释、阅读活动中成为意义的来源和依据,这样话语的软弱无力(作为简单事件)就被书写“拯救”了,也就是说,为了获得理解,

言谈中活生生的话语需要外在化为书写的话语。

### 三、“事件的印记”

书写形式具体到文学,作为对象的事件成为问题的核心。言语行为与人的一般行为的关系已经在 J. L. 奥斯汀(J. L. Austin)的《如何以言行事》中得到了充分的说明。言语行为自身的命题内容意谓一个行为事件,同时根据其以言行事的力量来认同某一个行为,暂时性的行为事件在书写的话语中获得了物质形态。利科进一步的提问是:在何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所做的被铭刻下来了呢?利科引入了一个“隐喻”:印记(empreinte)。行为事件在发生的时间中留下了印记,书写所铭刻的就是“事件的印记”(l'empreintes de l'événement)。

利科首先对作者——文本及代理人(agent)行为之间进行平行比较。作者与文本是分离的,同样,行为与其代理人也是分离的:行为一旦被施行,就成为社会现象,产生出自己的结果,其效果是我们无法预料的。上文已经说明,说话者的意向与文本的字面意义之间的距离使书写成为可能,这里代理与其行为之间的距离提供了书写的可能性。书写的话语所记录的就是行为事件及其过程:“所谓事件过程,当被书写时就在‘拯救’消逝着的话语,发挥着物质性事物的功能。”<sup>⑩</sup>行为事件在时间上打上烙印,只有被铭刻之后才能克服简单事件的暂时性,克服代理人的经历限制,以及明确意谓的局限。行为事件被书写后进入社会历史时间的领域,而社会历史时间是具有持续效果的场所,这样书写的话语就成为人类行为的文献,文本、作品、文学于是成为行为事件的“踪迹”和“印记”。进而言之,这“印记”的总和即历史本身:历史即人类行为事件在时间上留下的踪迹,打上印记的准“物”(thing),铭刻之物成为对人类行为持续性过程的记录,由记忆意向性地书写下来的“档案”。这就是说,人类通过对自身行为事件的书写来认识自身的历史。历史被这些“印记”标出之后,就同文本一样,脱离了单个行为者(作者)的控制,成为独立的实体,人类反而成为历史这场不知情节、结局

的游戏的参与者。

其次,我们说书写超越了言谈就在于文本中断了话语与其直接意谓的链接,与之相对,对有意义的行为事件的书写同样超越了事件发生的原初场景。这种书写使某个重要事件的意义克服、超越了其产生的环境,并且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可以被重新理解和界定。这一洞见很好地解释了文化现象及其社会环境的关系。针对行为事件的书写,利科指出:“这难道不是克服了特定社会生产条件的伟大文化作品的基本特征吗?这正与文本发展出新的意谓,构成新‘世界’如出一辙。”<sup>⑪</sup>利科将文本打开的新世界与黑格尔的“实现了的自由的王国”相提并论。从《法哲学原理》序言的第四节开始,黑格尔开始论及自由意志问题。他认为法的作为精神的东西以意志为出发点,意志是自由的,所以自由就构成法的实体和规定性:“至于法的体系是实现了的自由的王国,是从精神自身产生出来的、作为第二天性的那精神的世界。”<sup>⑫</sup>自由是意志的根本规定,它只有作为意志才是现实的。自由的王国要成为现实的东西依靠的是人的精神实践,即思维的对象化(理论的态度)以及自我的行动(实践的态度)的辩证统一。利科指出正是人的行为及其作品在新的历史环境中建构了“实现了的自由的王国”,他同样以文本的意谓功能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上层建筑的独立性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都注意到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在文学艺术活动中尤为明显,艺术发展不仅与物质、经济发展不平衡,还能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上层建筑的积极效应就是其实践性。在利科看来,上层建筑的独立性就体现在文本的非明显意谓中,某个作品不仅反映了它的时代,而且也打开了一个自身所拥有的世界,在成为历史文化遗留物的同时,也在读者的无限视域中超越了时代的局限。

再次,与文本的开放性相似,人类的行为实践也是开放的。文本是在与读者的对话交流中保存了意义的开放性,人类行为则在书写的话语中成为可以让“读者”理解的东西。作为“作品”的人类行为打开

了新的意谓空间,向一切可以阅读的人开放,一切有意义的事件及其行为,通过当前的实践而向这种实践解释开放。所以行动事件的意义就成为在未来的解释中不断生成的意义,裁决其意义的法官是黑格尔的世界历史,当代的解释并无特权。书写的文本对言谈-话语意义局限的超越不仅体现在文学话语的意谓功能上,人类的行为事件同样在其中得到了意义的开放效应,书写的话语在记录人类行为事件的同时,为理解人类自身的精神实践提供了中介,更为在新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做出有意义的行动事件奠定了基础。叙述以其对事件的铭刻最终让个体通过书写形式的中介超出自我经验的限制,抽身反观事件的意义,事件无论属于哪个时间维度,都以新的形式被重塑。这让一种具有实践性的反思成为可能:叙述不仅能创造性地表现事件的真实,更能与事件拉开一段距离。在利科看来,西方创世神话表明叙述可以铭刻原罪,亦可启迪生活。

西方创世神话往往是一种关于罪恶和堕落的神话,在巴比伦史诗和希腊神话中,人类的行为完全受制于神的爱好和设计,神在本质上并无所谓善恶,甚至更接近恶。从荷马史诗中欲望化的众神之王到《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极度暴虐的统治者,宙斯成为恐怖的象征。此类神话将人的罪恶归因于神的意志,而非人本身的选择。在圣经的原罪神话中,人们才开始思考自身恶的起源。亚当的堕落并非来自神的安排或他人(夏娃或蛇)的引诱,而是源自他内在的僭越欲望,旧约叙述者的语气倾向于对堕落者的谴责,人开始将人的恶归罪于自身,于是忏悔意识开始萌发。原罪神话乃至圣经神话的整体告诉我们的是人将为自己选择作恶得到应有的惩罚,同时虔诚地与恶作斗争的人将最终获得拯救,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勾勒的正是人类从堕落到救赎的整个历史:“通过展现开端与终结之间的历史,给予这历史一个动力、一个趋向、一个方向;从初始和启示的双重视域出发,它们为人类经验引入一种历史的张力。”<sup>③</sup>这样,原罪神话以象征的形式凝聚了历史的真实,原罪神话不仅仅是亚当的悲剧,还是以色列民族乃至人

类的命运悲剧,于是一个人的编年史揭示出所有人的历史意义。以现代的眼光质疑原罪神话的真伪并无意义,因为在“创世纪”中它是以历史事件的方式讲述了人之堕落的根源以及人之异化的普遍状况。这意味着每当我们作恶,都是在重复、摹仿亚当,亚当成为现实中恶的原型,象征着恶作为支配性的力量在历史中存在的连贯性。但利科并非意在强调暴力的历史合理性,而是以对恶之神话原型的反思达到理解,理解恶的根源在于浅薄的自由,即自由地选择暴力,而不去行使自由作为行动力量、存在力量的能力,创建更好的生活图景。这样,利科确证文学叙述对贯穿历史之恶的呈现提供的恰恰是一种希望的契机,正如伊波利特(Jean Hyppolite)将堕落视为人类绝对自身的一个构成:“堕落是全部真理的一个契机,绝对自身的表达不可缺少否定性事物。”<sup>④</sup>所以相对于屈从历史的暴力,我们仍可以事件为中介,重新思考这一暴力的历史,实践对更好生活的构想。事件在利科的哲学中成为存在的生成,在其中历史暴力的悲剧既能被看到,又兼具被克服的可能性。

#### 四、事件性之反思

利科的“事件解释学”显示出与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激烈斗争。按照黑格尔主义的历史哲学,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即合理的过程,在其中各种事件的发生都统一为一个目的(Telos),即“精神”意识到其自身的自由,不论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如何挣扎、是否情愿,或是否知悉这“目的”,他们的所有实践终将构成趋向这一目的的台阶。于是对历史的研究或叙述只能是“回顾”,在对“事件”的解释中无限论证理性最终胜利的合理性。“事件”在目的论、进步主义的历史哲学中无法获得超越历史总体结构的意义,也就是说,历史事件在此不具备真正的事件性。

在利科看来,黑格尔“理性的狡计”(die List der Vernunft)也不再能引起人们的好奇,反而令人厌恶:“就像魔术师再也变不出以前的戏法。”<sup>⑤</sup>对黑格尔主义的逃离被利科视为西方思想史上的一个事件,而那些仍然沿着黑格尔历史哲学,试图将西方的“精神”“观念”或“意义”打造为世界历史最终目的的哲

学家,那些“来自德国的大师”,其专断与冷酷在利科看来是不可宽恕的罪行。利科承认历史本身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由暴力推动的,帝国的兴衰、权利利益的承续、思想家权威的确立和巩固、精英们的文化享受如何建立在被剥削者的辛劳和痛苦之上等等,这些历史事件无不需要暴力的直接介入:“暴力看来是历史面貌得以改变的特有方式。”<sup>⑧</sup>但历史的思考者不可置身事外,听凭灾难发生。面对历史的暴力,历史学家的工作绝不应是接受“理性的狡计”的诱惑,为具体的事件给出一个合乎“目的”的解释。这被利科称为历史学家“坏的主观性”的滥用,而“好的主观性”在于对他人和其他价值的同情,在“历史”(historia)的本意“探询”(istoria)的维度上对他人开放,承认事件创造新的意义,如此才能切近历史的真正客观性。对总体化事件观的拒绝让利科有机会找到通向事件解释学的道路,思考事件创造新的意义和价值的方式。通过对晚期胡塞尔(Edmund Gustav Albrecht Husserl)历史观的考察,利科获得一种对抗总体化的事件观。

但必须指出的是,黑格尔并不否认历史事件的偶然性,他的辩证法弥补了这种决断论的不足:实在、真理是有内在联系且不断运动、生成着的,“绝对精神”的每一个阶段、方面、环节都彼此关联、相互转化,真理和实在是具体的、多维度的、活生生的,这在根本上构成了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批判。由此出发,在黑格尔论量变与质变关系的话语中,我们可以发现“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在黑格尔看来,任何事物都具有质与量的性质,但对于真理、实在而言,它的发展不仅仅是量的缩减或叠加,当量的变化达到一定的限度时,根本的质变将必然发生:“一方面定在的量的规定可以改变,而不致影响它的质,但同时另一方面这种不影响质的量之增减也有其限度,一超出其限度,就会引起质的改变。”<sup>⑨</sup>这预示着事物在运动过程中从渐进性的量的变化,在达到其限度的极限时将会发生在量的层级不可预估的质变,新的意义-事件被创造出来。黑格尔用水——蒸汽——冰的运动和农夫增加驴子负担的例子来说明

质-量的辩证法,似乎不能说明事件带来质变的可能性,但如果超出常识层面,将视野放至由人类抉择所产生的实践后果,事件将打破量的限制,开启质变层面的未来。张世英在论及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时说:“黑格尔指出,量变是渐进的运动,质变是渐进过程的中断。黑格尔在这里鲜明地表述了通过飞跃而发展的思想,打击了那种把运动归结为纯粹量变的形而上学观点。”<sup>⑩</sup>在张世英的阐释中,质变的飞跃打破量变的固有结构,表现为对事物发展进程的一种断裂性的突入,这就为事件的发生奠定了基础,也就是说黑格尔的辩证法为一种激进的事件思想保留了应有的位置。

回到20世纪60年代孕育“五月风暴”的思想场域,我们会发现新马克思主义者对黑格尔的普遍拒绝: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将黑格尔、青年马克思与“科学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萨特(Jean-Paul Sartre)则对《大逻辑》中黑格尔辩证法的唯物主义倾向置之不理。对此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有中肯的评价:“50年代的黑格尔化马克思是一个思辨形象,仍具有潜在的革命性。60年代反黑格尔的马克思是一个学者,但注定只能被用于学术讨论会。”<sup>⑪</sup>利科并非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对黑格尔的拒绝与结构主义或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一样,将对事件的思考紧紧局限于纯粹的学术场域,甚至是在学科范式的层面来谈论事件之于“结构”的优先性。他是以牺牲黑格尔的辩证法为代价,汲取胡塞尔现象学的事件观,运用到以语言为中介的意义创造活动的解释学中。巴迪欧认识到忽视黑格尔的代价,所以他对张世英《论黑格尔的哲学》(1956年)中的《论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十分着迷,甚至撰写“注疏”发挥黑格尔的质-量辩证法。在巴迪欧那里,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创造出不同的位置空间,量变是在其固有位置上的变化,未达到引发质变的限度时永远处于保守状态,而质变的飞跃产生的强制性变化将对位置空间进行颠覆性重构。在具体的政治决断层面,在量上日益占据优势的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不可能让革命终止于资产阶级主导的“民主革命”,这时要么夺取

政权获得绝对胜利,要么被摧毁,主动以行动触发质变的事件。这个被巴迪欧称为质的“积分化”(intégrale)与量的“微分化”(différentielle)之间的辩证法<sup>③</sup>,是一份必须得到尊重的黑格尔遗产。在理性的可计算范围内,无数事件在预期中发生,人们会习惯性地屈从于惯例或陈规,在量的层级维护现状的稳定,但此时质变已经悄然发生,在某个节点以全新事件的发生宣告历史的断裂和重启。这个新事件扰乱知识叙述的常规体制,将人们对全新未来的希望变为现实。在政治层面,最能体现“量-质”辩证法的就是革命事件的发生。利科以批判黑格尔历史哲学获得的事件观,虽然让他告别了结构主义和总体化的思维方式,但他没有赋予事件具体历史的内涵,同时回避了黑格尔辩证法中隐含的革命潜能,只是在人文主义学术话语的层面执着于解释人类意义创造事件的发生过程。

利科的“事件解释学”止步于作为语义解释的“叙述”活动,而如果一种“叙述”无法有效对事件本身进行批判,走向改变现实的实践,事件及其解释就无法真正产生意义。正是在此处,利科与马克思的差异展露无遗。利科认为马克思基于实践、“活劳动”的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同样无法摆脱“意识形态”的纠缠,而这让意识形态批判变得可疑,甚至充满走向暴力的危险性:“它(意识形态批判)有其必然性,只要它是为重建对话的公共空间,而不是以残酷的斗争为目的,后者的视野仅限于内战的范围。”<sup>④</sup>这样看来,利科的“事件解释学”最终要达成的是通过对事件的叙述,理解事件的意义,让对于事件的不同解释可以在不断的叙述中形成对话,形成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所谓的公共空间,并在此基础上规划未来行动的方向。解释学在此规避了真正意义上的冲突、暴力和革命。问题在于在不改变社会经济基础及其结构的前提下,个体自发的叙述能否对社会存在及现代人的日常生活产生切实的影响,叙述活动本身能否摆脱虚假意识的控制,甚至对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进行颠覆性反抗,这是利科“事件解释学”的限度所在。它的意义可能正在于提醒我们,

比“科学”地总结一套叙述学知识更重要的是对文学-事件及其叙述本身保持好奇,深刻理解叙述走向行动的潜能。

#### 注释:

① Paul Ricoeur. *Du texte à l'action. Essais d'herméneutique II*, Paris: Seuil, 1986, p.147.

② 赫伯特·施皮格伯格在著名的《现象学运动》中曾对保罗·利科的解释学与“语言转向”有所怀疑,他的理由很简单:以文本、作品为中心的解釋学不可能取消现象学,因为文本与现象不可能处于同一水平,文本本身就是以各种不同方式和外观在意识中显现出来的现象,所以需要“一种关于作为意识中事件的文本的描述现象学”(见赫伯特·施皮格伯格:《现象学运动》,王炳文、张金言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790页)。施皮格伯格虽然承认主体进入现象时文本的优先性,但两者之间的关系仍需进一步描述清楚,而这正是保罗·利科尚未完成的工作。《现象学运动》1982年的第三版第十二章后所列的利科研究文献截止到1978年,利科后期的重要著作如《解释学与人文科学》、三卷本《时间与叙述》《意识形态与乌托邦讲座》《作为他人的自身》等都没有收录。事实上,这些著作与其早期著作一起建构了嫁接解释学于现象学之上的“事件解释学”,并将其运用到对叙述这一人类特殊活动的研究上。

③ Paul Ricoeur. *Du texte à l'action. Essais d'herméneutique II*, p.184. 利科的思路在“事件哲学”中得到推进,如马里诺(Claude Romano)在《事件与世界》(1998年)中发展为一种强调事件优先于存在的事件解释学(herméneutique événementiale),将含有奇遇(aventure)意味的advenant确立为先于一切事物的发生,即此在(Dasein)的可能性或条件:“发生的解释学优先于此在解释学。发生(advenant)意味着它先于此在而来,在某种意义上它正是此在得以可能的条件。”(Claude Romano. *Event and World*, Trans. Shane Mackinlay, New York: Fordham UP, 2009, p.20.)文学的叙述与事件的关系得到进一步讨论。本文聚焦的是利科的事件解释学在诗学领域的具体实施。

④ Paul Ricoeur. *Temps et récit I*, Paris: Seuil, 1983, p.33.

⑤ Paul Ricoeur. *Life in quest of Narrative. On Paul Ricoeur: Narrative and Interpretation*, Edited by David Woo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p. 24.

⑥ 刘欣:《论保罗·利科的神话诗学》,《民族文学研究》2017年第1期。

⑦ Paul Ricoeur. *Oneself as Another*, trans. Kathleen Blamey,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2, p.142.

⑧赵毅衡:《广义叙述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67页。

⑨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64页。

⑩Louis O. Mink. History and Fiction as Modes of Comprehension, in *New Directions in Literary History*, edited by Ralph Cohe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4, p.117.

⑪汉娜·阿伦特:《过去与未来之间》,王寅丽等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245页。

⑫Paul Ricoeur. *Hermeneutics and the Human Sciences*, Trans. Jonh Thomps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p.240.

⑬洪汉鼎主编:《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432页。

⑭Paul Ricoeur. *Freud and Philosophy: An Essay on Interpretation*, trans by Denis Savag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0, p.27.

⑮Paul Ricoeur. *Du texte a l'action. Essais d'hermeneutique II*, Pairs: Seuil, 1986, p.139.

⑯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1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8页。

⑰Paul Ricoeur. *Hermeneutics and the Human Sciences*, p.161.

⑱Paul Ricoeur. *Hermeneutics and the Human Sciences*, p.168.

⑲Paul Ricoeur. *Hermeneutics and the Human Sciences*, p.170.

⑳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0页。

㉑Paul Ricoeur. *The Conflict of Interpretations*, Edited by Don Ihde, New York: Continuum, 2004, p.289.

㉒Jean Hyppolite. *Genesis and Structure of Hegel's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trans. Samuel Cherniak and John Heckman,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4, p.527.

㉓Paul Ricoeur. *Temps et récit III*, Paris: Seuil, 1985, p.297.

㉔保罗·利科:《历史与真理》,姜志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227页。

㉕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36页。

㉖张世英:《张世英文集》(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1页。

㉗巴迪乌:《巴迪乌论张世英》(外二篇),谢晶译,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9页。

㉘巴迪乌:《巴迪乌论张世英》(外二篇),谢晶译,第54页。

㉙Paul Ricoeur. *La Memoire, L' Histoire, L' Oubli*, Pairs: Seuil, 2000, p. 103.

## Back to Narrative Itself: On Hermeneutics of Event of Paul Ricoeur

Liu Xin

**Abstract:** In Ricoeur's usage "event" is not merely treated as discourse event. He brought "event" as literary object into his hermeneutics, which always related to "plot" in the field of narrative. Backtracking the traces of discourse, differentiating the levels of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rethinking the mechanism of meaning creation in narrative event, Ricoeur regards narrative as an "action" with internal driving force, and "event hermeneutics" thus constitutes a critical reflection on structuralist narratology. It reminds us that what is more important than summarizing a set of narrative knowledge "scientifically" is to keep curious about literature, events and their narratives, and to understand narrative skills and their potential for action. Ricoeur rejected structuralism and totalising theories, while he did not endow events with specific historical connotations, just obsessed with the explanations on the process of creating events at the level of humanistic academic discourse.

**Key words:** Ricoeur; Event; Hermeneutics; Narratology